



识到只有把剧中的意志来鼓动观客，那才是戏的真价值。”在《新民周刊》记者眼前侃侃而谈的，正是周信芳的孙女周依霖，恬淡的气质，白皙的肌肤，立体的五官，眉眼间既有其父周少麟的神韵，一颦一笑之间，更有其祖父周信芳与祖母裘丽琳的神采。少年生活在上海，在祖父母身边长大，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京剧艺术，周依霖永远记得祖父最常说的那句话：“做一个中国人，最重要的就是爱国。”长大以后，游历世界，最终周依霖还是选择回到了故乡上海，与丈夫、著名画家林学之一起，创办了“麒艺术中心”，为弘扬周信芳先生的艺术成就与人格魅力，尽一份家人的责任。

正如周依霖所说的那样，周信芳的一生，始终与时代发展的脉搏息息相关，站在时代的潮头，勇于探索创新。早在1913年，年仅19岁的周信芳就演出时装新戏《宋教仁被害》，用京剧的形式抨击袁世凯的反动行径。五四运动时，演出《学拳打金刚》，把矛头指向卖国贼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演出《洪承畴》抨击伪满汉奸。改编《明末遗恨》《博浪锥》，借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醉生梦死和专制独裁。周信芳演出《卧薪尝胆》时，报纸刊登的广告标题为：“唤醒国民，有益社会，激昂伟大，杰作佳剧”。演出《明末遗恨》“杀宫”一场时，剧中崇祯皇帝以悲凉深沉的语调对其子女说：“世上什么最苦，亡国最苦！世上什么最惨，亡国最惨！”“要知道亡了国的人，就没有自由了！”一字一句，催人泪下，全场观众无不为之扼腕动容，受到了深深的感染。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，周信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上海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后，周信芳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。他认为，京剧界的爱国艺人要同整个文化界的同志联合在一起，积极投身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。会上，周信芳还与欧阳予倩倡议，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歌（平）剧部。会议一致同意了这一倡议。几天以后，成立大会在卡尔登戏院举行，参加者有数百人。与会者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群情激昂，大家一致推选周信芳为歌剧部主任，随即开展了繁忙的救亡宣传活动。在这段岁月里，周信

芳不仅亲身奔赴近郊战场的前沿阵地，向抗日战士进行慰问宣传，去后方伤兵医院慰问负伤战士。还积极创作演出了《徽钦二帝》，表现亡国之痛，鼓舞民众奋起抗争。随后又陆续演出了《香妃》《董小宛》《亡蜀恨》等具有民族意识的剧目，将自己的演剧艺术融入了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。

也就在此时，周信芳与田汉、欧阳予倩等结为挚友，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。1946年9月20日，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后台，正在化妆准备演出，京剧界的中共地下党员吕君樵突然来访，他将一张请柬郑重地交给周信芳，周信芳接过来一看，只见请柬的落款写着“周恩来”三字。周信芳非常激动，但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派张颖同志来看望过他，并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。第二天，周信芳按照吕君樵的嘱咐，为安全起见，不坐汽车，步行到思南路107号周公馆，这里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。周信芳刚走进门，周恩来就迎了上来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你看对面就是国民党特务，今天你要是坐车，目标就大了。你看，复兴路口就有特务的车，跟踪起来很容易。”这一天，周恩来在这里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，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，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，鼓励与会者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。为了争取胜利的明天，一定要留在上海，坚持和平民主，坚持进步文化工作。会后，周恩来还特地把周信芳等几人留下，在一楼会

1948年，郭沫若（左二）、田汉（右二）与许广平（左三）、周信芳（右一）、冯乃超（右三）、于伶（左一）等人在鲁迅墓前。

